

毕沅幕府与乾隆后期诗坛

侯冬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毕沅幕府是清代中期影响最大的诗人幕府, 乾隆后期重要的诗人、学者几乎都入其幕府或与其有交游。在其幕府的雅集活动中, 毕沅以官方指导者的身份影响着文坛风气, 他一方面努力维护诗坛的“雅正”, 另一方面他又和幕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认同。毕沅幕府沟通了“朝”“野”势力, 体现了乾隆后期诗坛宗唐、宗宋诗风的融合, 并以幕府中“为东坡寿”这一活动, 促进了诗坛对宋诗的再认识, 是乾隆后期诗坛复杂文学生态的缩影。

关键词: 毕沅; 幕府雅集; 文学生态

中图分类号: I207.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2-0213-09

毕沅(1730—1797), 字纘衡, 一字湘衡, 号秋帆, 又号弇山, 因从沈德潜学于苏州灵岩山, 又自号灵岩山人, 镇洋人。乾隆二十年(1755)以举人补内阁中书, 入值军机处。二十五年(1760)进士, 廷试第一, 状元及第, 授翰林院编修。三十六年(1771), 任陕西按察使, 三十八年(1773)擢陕西巡抚, 抚陕甚久。五十年(1785)官河南巡抚, 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 督剿白莲教。二年(1797)病逝于湖南辰州官署, 赠太子太保, 赐祭葬。死后二年, 因案牵连, 被抄家, 革世职。著有《灵岩山人诗集》四十卷、《灵岩山人文集》四十卷。

毕沅好客爱士, 一时文学之士, 归其幕府者甚多,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云: “我朝爱客礼士者, 惟德州卢雅雨都转、苏州毕秋帆制府, 一时之士奔趋其幕府者, 如水赴壑, 大都各得其意以去。”^{[1](181)}王昶亦云: “秋帆制府少得师法于其舅张郎舟少仪。登大魁, 入词垣, 爱才下士, 海内文人咸归。幕府凡有吟咏, 信笔直书, 天骨开张, 无绘句繙章之习。又好刻书, 惠定宇征君所著经说, 奚为剗削。生平有干济之才。在陕重建省城, 又修华阴太白祠及泾渠。在豫开贾鲁河, 修桐柏淮源庙。金川用兵, 凡军装骡匹陆续协济。故深受主知, 取其所撰《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 录入四库馆书中……出领封疆, 入参侍从, 亦节使中所罕见也。”^{[2](84)}毕沅于乾隆后期历任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 为封疆大吏者二十余年, 其间文

士、学者入其幕者不计其数。毕沅公事之余, 时与幕宾相酬唱, 对乾隆后期文学、学术之发展影响颇深。

一、毕沅幕府的文学活动

(一) 陕西巡抚幕

毕沅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授陕西按察使司, 实兼巡抚之职, 三十八年(1773)擢陕西巡抚, 至乾隆五十年(1785)调任河南巡抚, 居陕达十余年, 此一时期乃毕沅幕府最兴盛之阶段。

毕沅开府关中, 地处古都胜邑, 名胜繁多, 又有太华终南之胜景, 兼之幕中文人汇集, 文学氛围浓郁, 一时诗酒流连, 为人所称道, 徐世昌云: “秋帆少从归愚游, 以能诗闻, 天性和易, 笃于故旧。开府西安时, 爱才下士, 老友如吴竹嶼、严冬友、程鱼门, 门人如邵二云、洪稚存、孙渊如、钱士兰诸人, 咸招至幕中, 一时名流翕集, 流连文酒, 殆无虚日。又性好游览山水, 为诗益多且工。”^{[3](635)}毕沅在公事之余与幕中文友时相唱和, 于署内辟“终南仙馆”为唱酬之所, 并将幕中文人唱和所得诗结集为《乐游联唱集》刊行, “终南仙馆”一时间名声鹊起, 有海内龙门之目, 杨芳灿为《乐游联唱集》作序, 描绘了当时之盛况:

《乐园联唱集》者, 我弇山夫子与同僚诸公之所著也。……古体今体、五言七言, 标骨气之端翔, 极

收稿日期: 2014-10-24; 修回日期: 2014-12-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中期艺文幕府文学与学术研究”(11XJC751001); 西北师大 2012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乾嘉幕府与清代中期诗学演进”(SKQNGG12006); 甘肃省教育厅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清代幕府与文学研究”(2014A-018)

作者简介: 侯冬(1982-), 男, 甘肃武威人, 文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清代文学与文化

音情之顿挫……温泉荒址,骊宫旧墟,韦曲风花,灞桥烟水,莫不陈之华馆纬以雄辞。^{[4](197)}

杨芳灿在序文中描述了毕沅幕府雅集的情形,“终南仙馆”环境雅致,格调高雅,俨然一幅超然尘世的画面。毕沅幕府内文学雅集名目繁多,幕宾之创作亦多样,既有抒写怀抱、赠答友人,古人所谓缘情之作,又有逞才竞艺,具有文学竞赛性质的诗艺竞赛,孙星衍在毕沅幕府中曾参与过这种唱和,“是时节署多诗人,约分题赋诗,各题拟古共数十首。同人诗成,君未就,与同人赌以半夕成之,但给抄胥一人,约演剧为润笔。既而闭户有顷,抄胥手不给写,至三更出诗数十首,有东坡生日诗在内,即文不属稿之作也。中丞叹为逸才,亟为演剧。”^{[5](457)}同人们不但约定了题目、体裁,还带有惩罚措施,为幕府唱和增添了斗艺的成分,也为幕宾们互相切磋诗艺增加了乐趣,无形中也使诗人们更加注重对诗歌创作技巧的追求。毕沅幕府中文人为熬过漫长无聊的严冬,即于冬日举为消寒之会,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毕沅与幕中文士举消寒之会,酬唱吟咏,所得诗歌成《宫阁围炉诗》。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八年云:“公以去岁关中年丰人乐,因与吴舍人及幕中文士为消寒之会。自壬寅十一月十七日始,每九日一集,至癸卯二月二日止,分题拈韵,成《宫阁围炉诗》二卷。”^{[6](178)}值得注意的是,毕沅幕府雅集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十二月十九日,毕沅必召集同人为苏公寿,毕沅自幼熟读苏诗,因此于古人中对苏轼情有独钟,初任陕抚后,毕沅即因苏轼曾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有感于“览乎遗文,嗟不并世,求其宦迹,近在于兹”^{[7](293)},而于衙署内招募友祀苏轼生日,自此之后,几乎每年毕沅都会在十二月十九日举行盛会纪念这位前贤。毕沅任陕抚十年后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毕沅即将历年为苏公寿所作《东坡生日设祀诗》结为一帙,序而刊之。这项活动毕沅坚持了近三十年,并凭借其幕府的影响力,将这一活动所蕴含的诗学旨归广泛地传播出去,对乾嘉之际乃至嘉道以后宗宋诗风之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 河南巡抚幕

乾隆五十年(1785),毕沅调补河南巡抚。当时河南“河工连年漫溢,卫辉一带,屡被旱灾”^{[6](182)},三年不雨,又加上黄河决口,民不聊生。毕沅看到这一切,深感责任重大,不能不殚精竭虑去应对,于是他积极与乾隆皇帝沟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民生问题,其《豫州纪恩述政诗十首》记录了他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截漕粮、祷时雨、蠲丁饷、给口粮、借籽种、疏汴河、免地租、设粥厂、种番薯、归售田等举

措,这些措施极大缓解了河南的灾情,使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

毕沅由陕赴豫,忙于政事,幕府文学与学术活动较陕西巡抚幕中有所衰落,所谓“豫省方积旱,又河工填委,不复有关中唱酬之乐矣”^{[8](395)},然其雅好文学,公事之余,仍不废吟咏,时与幕宾唱和。他的府邸即是西汉梁园故址,他在这里修筑了宴客之所,名之曰“嵩阳吟馆”,其在河南期间所作诗即名为《嵩阳吟馆集》。其河南巡抚幕府当中亦颇聚人文,洪亮吉、孙星衍、吴泰来等旧友在毕沅调任河南后,先后入其幕府,钱泳、方正澍、章学诚等人亦慕名而来。乾隆五十三年(1788),章学诚在毕沅支持下,开局编《史籍考》,凌廷堪、洪稚存、武亿、邵晋涵、孙星衍等与其事,时相酬唱、论学。吴鼐《国朝八家四六文钞》孙星衍原序记载:“岁乙巳,余客中州节署,值驛轩以公事至。时秋帆中丞爱礼贤士,严道甫侍读、邵二云阁校、洪稚存奉常皆在幕府,王方川编修亦出令来豫,极友朋文字之乐。”^{[5](460)}另据《梅溪先生年谱》记载,钱泳“九月启行,十月到开封,至巡抚节署。时同在幕中者,为吴竹嶼泰来、孙渊如星衍、洪稚存亮吉、章硕斋学诚、冯鱼山敏昌、方子云正澍、凌仲子廷堪、徐闾斋嵩,皆一时名宿也”^{[9](213)}。洪亮吉《北江诗话》亦记载了毕沅河南巡抚幕中延揽了许多当世学者,“前客河南抚署,亦有赠尚书诗曰:‘管下名山皆有岳,座中奇士尽谈经。’时邵学士晋涵、孙兵备星衍、钱州判玷及余皆在幕中耳”^{[10](2288)}。陈文述在诗中也描述了毕沅河南幕府雅集之情形:

珠履宾朋侍绛纱,曾闻幕府丽情赊。银灯夜赋梁园雪,玉勒春游杜曲花。别馆琴尊真洒落,后堂丝竹自豪华。只今联唱珍遗集,名世诗篇入大家。^{[11](卷六)}

毕沅移镇河南后,仍不忘每年为苏轼祝寿,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毕秋帆自陕西巡抚移镇河南,署中筑嵩阳吟馆,以为宴客之所。先生于古人中最服苏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洪授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拜罢张宴设乐,即席赋诗。和者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12](611)}毕沅在河南救灾还是很得力的,乾隆皇帝就曾赞扬毕沅抚豫之政绩:“如此尽心,民瘼或邀天佑,朕为彼一方民慰幸也。”^{[6](611)}毕沅赈灾于河南,关心民生,这也是其幕府唱和的重要内容,袁枚《随园诗话》记载,毕沅看到久旱的中原大地终于甘霖普降后,喜不自胜,召集同人作《喜雨》诗,毕沅所作尤为翘楚:“诗有气象。乙巳、丙午间,毕秋帆尚书抚河南,以亢旱得雨,集同人为《喜

雨》诗，诗多佳者。先生一联云：五更骤入清凉梦，万物平添欢喜心。词气自与诸人不同。”^{[13](71)}方正澍在幕中作《河南新乐府六章》纪毕沅之功绩，史善长云：“目击旱荒之苦，故举政发令，民无不感泣者。新安方上舍正澍，在公幕中为作《河南新乐府六章》，一请漕粮，二靖柘城，三开沙河，四赐诗扇，五种蕃芋，六设粥厂，公之事颇详。”^{[6](183)}《请漕粮》云：“丹书黄纸摘宸翰，甘万粮仍增十万。帖帖风帆来画船，村村版屋炊香饭。”《开沙河》云：“百姓熙熙皆喜色，百丈河工一日程。”^{[14](183)}其幕宾冯敏昌也作诗赞扬他的功绩云：“公先抚秦后抚豫，边无烽警河收工。”^{[15](16)}

(三) 湖广总督幕

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擢湖广总督。洪亮吉、汪中、毛大瀛、方正澍、章学诚先后至武昌节署。《北江年谱》记载：“八月，毕公擢督两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节署。时杨进士伦亦主讲于此，时与先生出游晴川、黄鹤诸胜，唱和甚多。岁暮，毕公甫自荆州堤工回署，汪明经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进士学诚亦先后抵署，谈燕之雅，不减关中。”^{[8](398)}这一时期，毕沅幕府又吸纳了一批学人，主要有江声、梁玉绳、汪中、史善长、胡虔、臧庸、邓石如等。毕沅出任湖广总督时，已至乾嘉之际，清王朝盛极而衰，颓势已现，社会矛盾加剧，各地起义不断，毕沅幕府文学学术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如钱泳所言，毕沅“总督两湖之后，荆州水灾即罢，苗疆兵事又来”^{[12](149)}，尤其是后几年，“武备不遑文事”^{[16](卷十八)}。虽然社会环境急剧恶化，但其幕府之中的酬唱雅集却没有停止过。乾隆五十六年(1791)，毕沅大会名流于武昌，祀苏轼生日。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文治、王宸、史善长、严观、杨搢集毕沅署中，观杨潮观所作《吟风阁杂剧》。聂铎敏《蓉峰诗话》云：“毕秋帆尚书，节制两湖时，袁简斋、王梦楼、洪稚存诸前辈，俱客署中，一时风雅特盛。先生公余吟咏，大雅不群，奄有渔洋风味。”^{[17](1444)}徐珂亦云：“太仓毕尚书沅开府武昌，幕下宾僚，多一时风雅之士。会重修黄鹤楼成，江都汪中为之铭，歙县程瑶田书石，嘉定钱坫篆额。过客登楼，叹为三绝。”^{[18](1385)}只是这样的雅集已经式微，难现昔日的盛况了。

二、毕沅幕府宾主之间的情感认同

毕沅为人随和，他“并不恃高位以召天下才士”^{[19](702)}，往往待人以诚，对幕宾毫无盛气凌人之感，洪亮吉赞曰：“公之爱士，出于至诚。”^{[10](400)}当然，毕

沅作为“纱帽”诗群的典型代表，使诗文创作“务期于正”，乃是其幕府创作中应有之义，如严迪昌先生所论：“达官大僚以权势、才学、名望、财力等诸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优势广揽人才，‘结佩相交’，并非只是一种纯文学的风雅韵事。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使‘务期于正’的指归得以贯彻于实践，从而净化着高层次人才圈的氛围。”^{[19](657)}诚如斯论。然而从毕沅与幕宾的交往来看，毕沅之礼贤下士、延揽寒士确实是“出于至诚”，于“务期于正”之指归之外，确是少了很多权术心机的功利性，而多了一些宾主之间的情感认同。

毕沅幕府提倡风雅，优待士人，极一时诗酒流连之盛的氛围，让心态处于惊悸和抑郁之中的士人们，感到了别样的温馨和归属感。毕沅幕宾多为寒士，时运不济，这些人的生活倍感艰辛，毕沅幕府能够接纳、礼遇他们，让他们有了栖身之所，并且能够继续钻研学问、潜心著述，因此幕宾对毕沅心存感激。乾隆盛世，优待文士，以稽古右文而著称，尤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代表，其他如《一统志》《续三通》等大型书籍的编纂，也汇集了诸多学者之力，这种官方组织进行的学术文化活动，一方面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大批士子提供了就业机会。许多怀才不遇之士，纷纷以此为契机，渴望为帝王家所用，来实现自我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20](54)}，梁启超曾论及这一情形：

外任学差或疆吏者，辄妙选名流以充幕选，所至则网罗遗逸，汲引后进，而从之游者，既得以稍裕生计，亦自增其学。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凡此皆有相当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故学者常乐就之。^{[20](59)}

梁启超的论述从整体上关照了乾嘉时代，帝王提倡稽古右文，方面大员亦从旁鼓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士子们提供了诸多机会，让他们能够一展才华，解决生计问题。不可否认，清朝统治者采用的文化怀柔政策，大大减低了文士们对异族统治者的敌对情绪，同时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统治者以此等怀柔之策，想要达到禁锢士人思想，将文化发展纳入到统治的轨道中的目的。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冷酷的压制。

乾嘉号为盛世，实则是朝廷怀柔与控扼两种手段相结合而成就的。如果怀柔之策以康熙朝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为开端，那么铁血的控扼则是以康雍乾三朝惨烈的文字狱为代表。毕沅所处的乾隆朝，乃是清代文字狱之顶峰，又以毕沅开府西安后的乾隆四十年

(1775)至五十年(1785)的十年间为高发期,乾隆帝借文字狱案打击了汉族文化精英,想要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因此一方面使这一阶层中的某些人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引导士人走上考据之道路,避免其与社会现实发生接触,最后一些不为所用者、不愿合作者就面临了残酷的镇压,这些士人们往往因言获罪,殃及亲朋。这是统治者在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不合统治者心意,有碍满族贵族统治的言论必须要全部扼杀。乾嘉之际的士人曾言:“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碍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规景,畏避太甚。见螭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1](250)}由此可见乾隆盛世,尤其是乾隆后期文化氛围是多么的肃杀。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帝王要求士风、学风都与盛世相呼应,不谐盛世景象之声音,都被淹没。然而恰恰有大批的博学之士,或未能进入庙堂,或不愿埋首于故纸堆中,从而游离于朴学之外,遁迹草野、息影山林,表现出与统治者意愿相背离的趋势,对于这些谪宦迁客、布衣匹夫来说,所谓“士子稍读书者,即不忧贫矣”^{[20](62)},却与自己无关,由于与统治者倡导之思想有偏差,或者于“盛世”中保持自我意识与冷静的思考,这些士人往往不得意于仕途、沉沦下僚,以毕沅幕宾为例,洪亮吉与黄景仁即为典型。

洪亮吉仕途颇为不顺,屡试不售,久困场屋。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三十六岁时,应陕西巡抚毕沅之招入其幕府,在其幕达七年之久。洪亮吉为人耿直,对于当时学者皓首穷经,不问时事之学风颇为反感,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说:“盖闻理无所宜,必求实效,用各有适,无贵虚名。”^{[10](270)}表明了他重视实用的观点,又不喜考据之学:“不作章句儒,平生慕奇节。曲太日系肘,取与日用切。”^{[10](468)}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要求士人关注现实,这显然与官方的指导思想不相符,因此久困场屋难登仕途,待其通籍后,也因思想的边缘化而外放。嘉庆四年(1799),又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深感国家多乱而无直言之士,写了近六千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嘉庆皇帝因文中有“朝事太晏”“小人荧惑”等语而震怒,即交军机大臣及刑部严加审问,以“大不敬”治罪,拟斩立决。后奉旨免死,遣戍伊犁百日赦还,编入地方监管。可见如洪亮吉此类关注现实,敢于直言的人,于“盛世”之中乃是异类,其言行对统治者来说,无异于是抹黑盛世,挑战统治者的权威,其遭受打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景仁诗负盛名,为“毗陵七子”之一。他诗名早著,才华为当世所赏,然而他却未能步入仕途,一

生连举人也未中,短暂的一生多在游幕中度过。黄景仁以诗鸣于世,本来在那个重视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可以生活得很好,然而其诗歌创作却是与“盛世”格调格格不入,有违统治者之“指归”的。在那个文网高张,要求以诗饰世的时代,黄景仁却在诗歌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以诗来鸣不平,来揭露浮华掩盖下的社会现实,在他笔下展现的是一个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人情险恶、人皆如行尸走肉般丧失自我意识的世界,这显然与统治者所鼓吹的“承平”是背道而驰的。包世臣曾言:“仲则先生性豪宕,不拘小节,既博通载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见时流齷齪猥琐,辄使酒咨声色,讥笑讪侮,一发于诗。而诗顾深稳,读者虽叹赏而不详其意之所属,声称噪一时,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22](202)}可见黄景仁诗才之高,亦可见其“狂狷”之性格以及仗义执言、不粉饰太平之诗风。然而他所处的是一个不需要个性、不需要不同的声音的时代,因此其才虽高,却命运多舛,一生潦倒,难入主流。即便诗文为当道所赏,却难以进入庙堂。

毕沅于乾隆后期为方面大员二十余年,其幕府吸纳了大批文士,诸如黄景仁、洪亮吉等不入俗流之士皆为其接纳。洪亮吉曾感言:“亮吉夙蒙国土之知,久处宾僚之位,狂瞽时陈,而公不愆。”^{[10](400)}而毕沅得知黄景仁之才名与窘况后,派人持金延其入幕府,又为黄景仁捐得县丞一职。黄景仁客死他乡后,也是他资助归葬。毕沅以真心待客,不以名位压人,得到了幕宾的认同,幕宾们纷纷对毕沅表达感激之情,吴照诗云:“不将名位压逢掖,直宽礼数如朋俦。倘今李白生并世,定然不慕韩荆州。杜陵枉用夸广厦,白傅何须矜大裘。”^{[23](补编)}王文治写下了“一贵一贱交态殊,如古谊近所无”之句^{[24](504)},冯敏昌亦云:“犹希再谒文帅府,更想一附芳兰丛。”^{[15](160)}邵晋涵诗云:“英英幕府才,奕奕东南秀。宏奖雅轮扶,清词玉泉漱。”^{[25](659)}吴照云:“得同斯世宁非幸,难久从游益自怜。知己恩深双泪落,汉江水满一帆悬。”^{[23](卷七)}凌廷堪赞曰:“铃辕虚清谒,幕府盛宾朋。”^{[26](43)}

不惟如此,同为天涯旅人的漂泊感,更进一步加深了毕沅宾主之间的情感认同。在专制社会,为官者颇为不易,既要小心揣摩圣意,又要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处理好与同僚之间的关系,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身心倦怠是很正常的事情。毕沅身为方面大员,责任重大,事务繁忙,因而常常有归隐山林的想法,袁枚《随园诗话》云:“昔人称谢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丘’。范希文经略西边,犹恋恋于曩日之圭峰月下,与友人书,时时及之。秋帆尚书巡抚陕西,有《小方壶忆梅诗》,……张文敏公《题横山西庐》云:‘壺日

静中缘，我亦曾经四小年。不及苍髯墙外叟，梅花看到菊花天。’与毕公同有‘心在一丘’之想。”^{[27](78)}毕沅之“雅志东山”之意溢于言表。只因为官实为一苦差，政事处理不好会受到惩罚，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冒赈案，毕沅即因处理不善，而被乾隆帝褫夺一品顶戴，降为三品，并罚银五万两。除此之外，官场中争斗十分激烈，一不小心即会被牵连，毕沅生前仕途还算顺利，然死后却因依附和珅而被抄家治罪，《随园诗话批语》云：“秋帆为人却浑厚，善于应酬，风流则有之，功勋则不敢许也。其先世以棉花买卖起家，出于相国敏中门下。后又寄和相国珅门下，遂至督抚。和珅败后，抄家夺谥，一败涂地，后人亦无继起。”^{[27](636)}可见互相倾轧的官场之险恶。毕沅有感于此，常常表现出对“出世”的渴望，他的诗歌中这样的情绪随处可见，如：

对酒自怜羁宦久，感时渐觉入秋深。夜阑红烛频遗照，瘦影孤横绿绮琴。(《终南仙馆丛菊盛开，邀冬友、竹嶼、友竹、石亭、献之宴集》)^{[7](282)}

世情饱尽翻云手，时命真同上水船。后夜临鸡啼晓月，壮心应倦著先鞭。(《金城寓斋与座上诸君述旧感赋》)^{[7](213)}

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梦中得诗》)^{[7](254)}

为恋主恩非恋职，只求民隐不求名。千番幻境千真境，半世名场半宦场。(《六十生朝自寿》)^{[7](364)}

读毕沅这些诗句，行役之苦，羁宦之思时时流露。在所谓“盛世”之中，不得不处处小心，毕沅仕途较他人算是比较顺利了，但也不得不奔走诸如于敏中、和珅这样的权贵之门才能官运亨通，然而面对着官场的黑暗，往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整日与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状态下生活，毕沅深感身不由己，壮志消磨于俗世之中。可见，不惟在高压政策下生存的士人们感到壮志难酬，以毕沅这样的方面大吏也表现出了对独立与自由的强烈渴望。况且毕沅以汉人而历任要职，虽然在别人看来是“恩遇之隆，汉大臣莫及焉”^{[28](720)}，但在重满轻汉的大环境之下，毕沅为官之举步维艰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都让毕沅与在文网高张下苟活于世的士子们产生了共鸣，所以毕沅写下“人生悟得南华旨，任尔凭虚撒手行”^{[7](293)}，也就不足为奇了。毕沅为宦也如同游幕的士子一样，深感漂泊之苦。游幕文人为了生计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得不告别父母妻儿，而背井离乡。身为朝廷命官，受命于帝王，无法自己选择任职之地，他半生为宦，足迹踏遍陕西、河南、山东、湖广等地，饱受奔波之苦，“孤蓬万里征”“羁宦”“羁旅”是其心理的真实写

照。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父母在，不远游”，而漂泊在外最易牵动乡关之情，黄景仁《别老母》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29](68)}，就是在外漂泊之人最沉重的感情。毕沅虽位极人臣，地位高贵，也有思乡之情。因此，同为迁客，乡关之情又拉近了宾主之间的距离，宾主间常常互诉着对故乡的怀念，请看下面的诗句：

西风吹游子，关塞独漂泊。(毕沅《陇头水》)^{[7](226)}

不知佳节到，都为客愁亲。(毕沅《宿同谷》)^{[7](229)}

荡漾花间白露光，秋衾抱影卧虚堂。书来颠倒千回读，三岁相思字八行。(毕沅《都下故人贻书问询鄙状，惠赠白玉念珠一串，展缄复读，词意悱恻，令人赠离索之感率成绝句六首却寄》)^{[7](253)}

乡园五千里，风景常回溯。羁愁花合知，离恨莺能诉。(王文治《方伯署斋试碧螺春新茶次韵一首，茶产洞庭山胡云坡廉使新寄》)^{[30](505)}

宦游十载陇头人，最忆江南物候新。(杨芳灿《忆江南早春赋》)^{[31](153)}

遥山十二巫峰小，泽国三千客路长。冠剑登临征胜概，鱼书时寄水云乡。(邓石如《和毕秋帆岳阳楼诗》)^{[32](146)}

离索之感、孤旅之愁、游子之情溢于言表，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使毕沅和幕宾们惺惺相惜，引为同调，严长明赴陕时毕沅写下了“一笑俱综合，三秋离恨删”之句^{[7](251)}，这种友谊与认同已不能简单以宾主视之了。毕沅俨然成为了在野士人的精神领袖，因此，毕沅与幕宾之间相互认同的角度来看，毕沅幕府确实成为了“人才的吞吐港湾和心绪的调整园地”^{[33](657)}。

三、毕沅幕府与乾隆后期诗坛

毕沅幕府存在的乾隆后期，诗坛上一派门户分立、各主一说、相互辩难的景象。毕沅以高位主持诗教，虽然没有理论方面的建树，但其在乾嘉诗坛的影响却很大，乾嘉之际的舒位作《乾嘉诗坛点将录》，将沈德潜、袁枚、毕沅目为“诗坛都头领三员”。而沈德潜已于乾隆三十三年(1769)离世，因此乾隆后期诗坛执牛耳者实为袁枚和毕沅，袁枚以“性灵说”之理论建树总领诗坛，毕沅则凭借高位鼓扬风雅。时人亦将袁枚和毕沅视为诗坛盟主，如孙星衍诗云：“惟有先生与开府，许教人吐气如虹。”徐闻斋诗云：“弇山尚书仓山叟，海内龙门两扇开。”^{[27](290)}将毕沅和袁枚相提并论，并将袁枚随园和毕沅幕府视为“海内龙门”。袁枚也曾称赞毕沅曰：“吴中诗学，娄东为盛。二百年来，前有

凤洲,继有梅村;今继之者,其弇山尚书乎?”^{[27](275)}袁枚的评价虽有溢美之嫌,但也反映出毕沅在乾隆后期诗坛之地位。

毕沅出沈德潜之门,沈德潜推尊盛唐之音,毕沅亦颇喜唐诗,对宋人生僻一路颇为反感,在为严长明诗集作序时,毕沅即表达了这一观点:“而余独怪近今少年,甫窥甲乙,方当有事于脩青妃白,而乃摛拾宋人残藩,务以生涩自文,俾观者如噉昌歜,食到芟攢,眉楚齿急,思摒弃为快。”^{[34](606)}然其较沈德潜已取径较宽,不为“格调”所限,对待六朝、晚唐甚至宋诗都态度宽容,兼收并蓄。洪亮吉云其幕府之中“谈经贾服,作赋衍横。兼收并蓄,宾坐纵横”^{[10](400)},不以门户、家数为藩篱,有融合唐宋之势。史善长亦云:“文选泛览秦汉唐宋诸大家,穷其正变;诗取眉山。上溯韩杜,出入玉溪、樊川之间,盖甫入文坛,已独树一帜矣。”^{[6](127)}幕宾张坝诗云:“先生巨擘今诗人,祖李述韩为儒宗。”^{[35](194)}道出毕沅作诗也走唐人一路,而为其所赏的幕宾如黄景仁、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的诗作亦接近唐音,袁枚说:“近日文人,常州为盛……黄景仁字仲则,诗近太白;孙星衍字渊如,诗近昌谷;洪亮吉字稚存,诗学韩杜:俱秀出班行。”^{[27](164)}毕沅对苏轼的诗歌十分喜爱,毕沅在母亲张藻的教导下,自幼熟读苏轼之诗,《重过东湖》诗云:“焚香莫怪低头拜,熟读公诗已卅年。”^{[7](307)}开府西安后,毕沅即召集同人,为苏轼祝寿,并以“诗弟子”自居,其《夜憩东湖与严冬友侍读宛在亭玩月》诗云:

溪山曩溯浣花迹,水木兹寻嘉佑年。论我平生太侥幸,宦迹多得近前贤。苏门一派瓣香残,衣钵由来付托难。留得东湖湖上月,分明许我两人看。^{[7](269)}

诗中以苏轼之继承人自居,对苏轼之仰慕溢于笔端。又《十二月十九日为东坡先生生辰,集同人设祀于终南仙馆赋诗纪事,敬题文衡山画像之后》序云:

月建嘉平,日在辛巳,宋故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苏文忠公之降辰也。览乎遗文、嗟不并世,求其宦迹,近在于兹。兼以岁序将阑,丰年告庆,爰集胜侣,洁彼庶羞,几筵既清,画像斯肃,致恪则或歌且舞,崇仪则迎神降神。于时和气在堂,清光向夕,明襟之雅,既绍南皮,嘯歌之声,有逾东洛。庭余积素如登聚星之堂,山送遥青居然横翠之阁。嗟乎!尚友之志,颂诗读书;仰止之诚,列星乔岳。七百余岁,抚几而如存。十有四人操觚而竞赋,逮至斜月没树,音犹绕梁,严霜侵衣,饮始投辖。中心好之骊驹之咏且止,岁云暮矣,蟋蟀之旨勿忘。斯集者诗无不成,……今序而传之,亦以纪嘉会著良时,并使后人祀公者有所述也。^{[7](397)}

毕沅表达了对苏轼的景仰,并且以祭祀这种非常严肃的、带有仪式性质的形式来纪念苏轼,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毕沅诗中有“酌酒寿公公色喜,满堂尽是诗弟子”“公婆饮食必以祝,卅年向往之苏门”“予不识公频梦公,指点诗学启聩蒙”“诗公从政学公诗,磨蝎生来命守宫。国士声华重乐泉。罪人名氏书元祐。贤如韩琦司马光,挤之不许上玉堂。西台营营鼠子辈,诗人例得投穷荒”等句^{[7](197)},不仅以苏门弟子自居,而且还对苏轼因政治斗争而遭受迫害,表达了同情和不满,表示要以苏轼为榜样,“诗公从政学公诗”。其实,我们由毕沅幕府之中唱和之作可以看出,毕沅对于苏轼之喜爱,更多的是出于对其美政与人格魅力的仰慕,对于苏诗诗歌模仿的却不多,与后来推崇苏诗的文人不同,毕沅及幕友的唱和中,是很少用苏轼诗之韵的,用唐人韵却很常见,如《集石供轩席上效香山一字至七字体诗,同赋牡丹二首》《新春效长庆体赋生春诗四首》等,可见毕沅还是偏向唐音的。但其对苏轼的提倡,却表明了他对宋诗的重视,苏轼之于宋诗,犹如李、杜之于唐诗,乃是最杰出的代表。毕沅站出来为苏轼张目,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宋诗的认同。他虽不喜宋人生僻、艰涩的一路,但对于宋诗,已不像沈德潜那样完全地否定,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耐心和宽容。由于他的提倡,使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宋诗的重新认识也逐步展开,毕沅坚持这一活动近三十年,对于扩大苏轼在诗坛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嘉道之际,宋诗再次成为诗坛主流,客观上,毕沅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毕沅对于苏轼的推崇,也是当时诗坛风气的一种体现,反映出乾隆后期诗坛唐宋融合的趋势。乾隆后期,诗坛在性灵说的冲击之下,很多文人开始理性地看待诗歌的发展,对门派、家数之说已非常不满,袁枚就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帝王之国号而转移哉?亦犹道者,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统自居,谓宋以前直至孟子,此外无一人知道者。吾谁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谓唐以后无诗,即宋儒习气语。倘有好事者,学其附会,则宋、元、明三朝,亦何尝无初、盛、中、晚之可分乎?节外生枝,顷刻一波又起。庄子曰:“辨生于末学。”此之谓也。^{[27](148)}

袁枚此论,道出了诸多文士对诗分唐、宋,以朝代分优劣的不满。因此,毕沅等人主张调和唐宋,跳出家数的藩篱,乃是诗坛发展之趋势。毕沅也不排斥袁枚之“性灵说”,他在《题袁简斋前辈随园雅集图》

诗中写道：“坛坫东南属我徒，几人姓氏满江湖。”^{[7](351)}言语之中很有几分自豪，以能与袁枚相提并论为荣。且毕沅还资助袁枚刊行其《随园诗话》，显见其对性灵说是很欣赏的。钱大昕后来总结毕沅诗文创作时还指出，毕沅对性灵说有所吸收纠正，钱大昕云其创作“要自运性灵，不违大雅之旨”^{[36](720)}。袁枚之性灵说历来受到馆阁文人的抨击，袁枚主张独抒性灵，表露真实的情感，因而其诗作多涉及男女情爱，甚至讥消圣贤。这样的作品在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面前显然是有伤风化，不为封建卫道者所接受的。卢见曾就深鄙袁枚为人及其性灵说，翁方纲亦深恶“性灵派”，但毕沅却能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它，这说明乾隆后期诗坛各种理论之间出现了互相借鉴、融合的趋势，也说明庙堂诗人对性灵派的态度有所转变。

然而毕沅毕竟是“纱帽”诗群的代表人物，他代表着庙堂诗人，是清代文化政策的官方代言人和执行者。对儒家传统诗教和其师主张的“温柔敦厚”的坚持，使其影响和制约着乾隆后期诗坛。如前所述，毕沅幕府接纳了大批寒士，除了爱才好士之外，将这些在野的势力，纳入到统治的轨道上来，恐怕也是毕沅为盛世歌太平的一种自觉的体现。毕沅编刻《吴会英才集》即反映了庙堂势力对诗坛的主导和影响。^{[37](57)}乾隆五十年(1785)，毕沅刊刻了《吴会英才集》二十四卷，此集共选录十六家诗，分别为：方正澍《伴香阁诗》二卷；洪亮吉《附舄轩诗》一卷、《卷施阁诗》一卷；黄景仁《两当轩诗》二卷；王复《树萱堂诗》二卷；徐书受《教经堂诗》二卷；高文熙《阙清山房诗》一卷；杨伦《九柏山房诗》一卷；杨芳灿《吟翠轩诗》二卷；顾敏恒《笠舫诗稿》二卷；陈燮《忆园诗钞》二卷；王嵩高《游梁集》一卷；杨揆《桐华吟馆稿》一卷；徐嵩《玉山阁稿》一卷；石渠《翠茗馆诗》一卷；孙星衍《雨粟楼诗》一卷；王采薇《长离阁诗》一卷。毕沅选入的这十六个诗人中方正澍、洪亮吉、黄景仁、王复、徐书受、杨芳灿、孙星衍和陈燮都为毕沅幕宾。除了宏奖风流之外，毕沅刊刻《吴会英才集》还想以此集作为鼓吹休明之工具，以起到“垂范”的作用，他在序言中即表达了这一想法：

国家之盛由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又皆在于国家承平百年、大化翔洽之后，汉之元狩、唐之开元是矣……开元之时，花萼金鉴之制导其端，其时为之卿相者张说、苏颋，所谓燕许大手笔也，而高、岑、王、李诸人亦出焉。此十数人者，所为诗文类皆瑰伟英特、清雄华茂，而无哀思感激之音、憔悴婉笃之旨，则采士大夫之风而世之全盛可知矣。今国家承平亦百余年之久……于是士之生其间者，亦皆能和其声以鸣国家

之盛。以余所知若集中诸子，皆一时之俊也，而或入直承明，或出为牧领，诗人之遇又迥非汉之冯衍、赵壹，唐之罗隐、方干所比，故其诗亦皆无憔悴婉笃之旨、哀思感激之音，则所遭之偶然也。^{[38](卷首)}

这篇序文明确表达了毕沅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他认为自己所处之时代，可以与汉唐盛世之元狩、开元相媲美，而诗风又能反映国家的兴衰。既然自己身处“盛世”，那么士人们所创作的诗歌，应当是“瑰伟英特”“清雄华茂”，能够与盛世之气象相适应的，要以诗“鸣国家之盛”，起到润色鸿业的作用。他认为“世之全盛”，应当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这是典型的要求以诗饰世的主张。而那些表现“哀思感激之音”、反映“憔悴婉笃之旨”的作品，是不应当出现在盛世之中的，也是与盛世风范不相符的，是有碍于世道人心的。显然，毕沅的这种观念与最高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清圣祖康熙曾谕示：“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就是要求将文学创作纳入到封建统治当中来，一切违背统治的弦外之音均属打击之范畴。而乾隆皇帝更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寓禁于征”的《四库全书》的纂修，一心一意要“为万世臣子植纲常”^{[39](559)}。毕沅座师沈德潜于乾隆初期倡导“格调说”，即是“仰体圣意”的结果，作为文学侍从，沈德潜清楚知道统治者所谓“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含义，因此他在《说诗晬语》中明确指出了诗歌有益于邦国，有益于统治才是根本，“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40](186)}沈德潜所提倡的以诗歌来规范人伦教化，设教邦国可谓深得乾隆之心，因此其耆儒晚遇、恩眷之隆也就不足为奇了。毕沅身为执掌文衡、制约文坛的封疆大吏，其对帝王意图的领会自不在话下，况且，沈德潜因以文教而得高位，深得帝王眷顾，为毕沅等人树立了榜样。同样，沈德潜死后因曾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序，而被乾隆指责为“昧良负恩”“玷辱搢绅”，夺其谥号，仆其御笔题碑，毕沅亦不能不有所震动。因此他在编选《吴会英才集》的过程中，即以“温柔敦厚”为原则，不符合盛世气象的诗歌，皆被其裁汰，不予选录。我们可以看到，毕沅所选刻的这十六家诗人，几乎都是寒士或罢官文人，生活困顿、沉沦下僚不为俗流所赏是其共同特征，基于自身的遭遇，他们的创作或诉自身之苦，或言盛

世之悲,显然是不能以“鸣国家之盛”视之的。在乾隆时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格外关注,乾隆一心要宣扬正统的学术文化以正风俗,他说:“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39](1433)}而在这—空前后的文化工程进行的同时,通过对书籍的禁毁、窜改等方式,统治者传递了这样的一些信号,所谓关涉世道人心的诗文,不但不能涉及夷夏大防这样敏感的话题,而且那些对时代表示不满或愤激,甚至有所感伤或想要遁世的言论,显然也是不被统治者接受的,如乾隆时期朝鲜使臣柳得恭在《溟阳录》中记载,他在北京时偶然得到一幅画,题为“石湖鱼隐图”,当时在场的翁方纲观之,摇手表示不妥,其理由便是“盛世安得有隐?”^{[41](卷二)}由此观之,这十六家诗人之诗,恐怕大多是乾隆所谓“风俗人心之害”,然而毕沅却以这批寒士的创作作为样板,并说他们的诗歌并无“哀思感激之音,憔悴婉笃之旨”,以天下公认的寒士之诗,来为盛世作衬托,并且说这些诗人之不遇,与汉代之冯衍、赵壹,唐代之罗隐、方干不同,不是时势使然,只是个人遭遇的不幸罢了。当然,毕沅在选刻这些诗作的时候,做了巧妙的“处理”,毕沅虽然同情这些寒士诗人的遭遇,但是他认为这无碍于盛世,只是诗人自己的命运不济或者行为不检所造成的,从而为“盛世”作辩解。如其在《吴会英才集》为黄景仁作的小序当中就将黄仲则之“不遇”,归结为黄的“不自检束”,“黄少尹风仪俊爽,秀冠江东。初依竹君学使,公燕太白楼,援笔成诗,时有神仙之望。自游京邑,声誉益华,卒以不自检束,憔悴支离,沦于丞倅,高才无贵仕。悲夫!曩以薄游关中,绸缪觞咏,才贤并集,实谓胜游。逾年,客死安邑,人传其《过平遥》绝句云:疑是晋卿灵未泯,九原风雨逐人来,词虽警绝,信为诗谶。”^{[42](592)}黄仲则的诗歌号为“盛世哀歌”,他的诗情张扬在乾嘉诗坛颇为罕见,对于无人敢言的压抑于士人心头的怨愤,肆无忌惮的倾泄是他诗歌的特征,将“讥笑讪侮一发于诗”,因此他的诗歌是背离“温柔敦厚”之诗教的。以他为代表的寒士们显然对盛世充满了疑惑、怨念,因此也表现了对统治者的离立之感。毕沅将其诗选入《吴会英才集》,自然是由于黄仲则“秀冠江东”“声誉益华”,同时也应看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毕沅选入黄仲则等人诗的时候,将不合指归之作尽数裁汰,留下的只是那些“瑰伟英特”之作,以此来“润色鸿业”,以起到榜样的作用。毕沅自然感叹黄仲则之才,同时指出黄“高才无贵仕”,乃是自己行为放荡所致,其用意不可谓不深。

要之,乾隆后期毕沅以学者型官员主持一代风雅,大量在野诗人依附于他。他提携后进,为寒士提供栖

身之所。同时,又以庙堂身份指导着寒士们的创作。作为方面大员和文坛领袖,毕沅幕府的文学活动反映乾隆后期诗坛复杂的文学生态:他倡导的“为东坡寿”的雅集活动,带动并体现了宋诗在乾隆后期被人们再次关注,为晚清宋诗运动启了先声;他的幕府沟通了“朝”“野”,融合了唐、宋,亦不排斥“性灵”,显示了清代中后期诗坛风气的微妙变化;毕沅编选以其幕宾为骨干的《吴会英才集》,既是出于爱才,亦含有官方意识形态,可见乾隆后期庙堂势力对寒士诗群的控制力的惯性仍然很强。

参考文献:

- [1] 陈其元. 庸闲斋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 王昶.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M]. 周维德辑校.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 [3] 徐世昌. 晚晴簃诗话[M]. 傅卜棠编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4] 杨芳灿. 乐游联唱集序[C]// 芙蓉山馆全集(卷四). 续修四库全书(1477册).
- [5] 张绍南. 孙渊如先生年谱(第119册)[C]//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6] 史善长. 弇山毕公年谱(第106册)[C]//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7] 毕沅. 灵岩山人诗集(卷三十一)[C]// 续修四库全书(1450册).
- [8] 吕培. 洪北江年谱(第116册)[C]//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9] 胡源. 褚逢春. 梅溪先生年谱(第122册)[C]//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10] 洪亮吉. 洪亮吉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1] 陈文述. 忆旧[C]// 碧城仙馆诗钞(卷六), 嘉庆十年刻本.
- [12] 钱泳. 履园丛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3] 法式善. 梧门诗话合校[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14] 方正澍. 河南新乐府六章[C]// 子云诗集(卷六), 清乾隆刻本.
- [15] 冯敏昌. 送毕中丞秋帆沅节制全楚[C]// 冯敏昌集,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0.
- [16] 章学诚. 上朱中堂世叔书[C]// 章氏遗书(卷二十八), 清道光刻本.
- [17] 钱仲联. 清诗纪事[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18] 徐珂. 清稗类钞(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9] 严迪昌. 清诗史[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 [20]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21] 李祖陶. 与杨蓉渚明府书[C]// 迈堂文略(卷一), 续修四库全书(1672册).
- [22] 黄葆树等. 黄仲则研究资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3] 吴照. 奉呈弇山尚书长歌一首[C]// 听雨斋诗集(补编), 乾隆五十九年南昌刻本.
- [24] 王文治. 赠毕秋帆中丞[C]// 梦楼诗集(卷十三), 续修四库全

- 书(1450册).
- [25] 邵晋涵. 留别毕弇山中丞沅一百韵[C]// 南江诗钞(卷四), 续修四库全书(1463册).
- [26] 凌廷堪. 大梁上毕大中丞[C]// 校礼堂诗集(卷五), 续修四库全书(1480册).
- [27] 袁枚. 随园诗话(卷四)[C]// 随园诗话(附录).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0.
- [28] 钱大昕.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C]//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29] 黄景仁. 两当轩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0] 王文治. 方伯署斋试碧螺春新茶次韵一首, 茶产洞庭山胡云坡廉使新寄[C]// 梦楼诗集(卷十三), 续修四库全书(1450册).
- [31] 杨芳灿. 芙蓉山馆全集(卷一)[M]. 续修四库全书(1477册).
- [32] 邓石如. 和毕秋帆岳阳楼诗[C]// 穆孝天, 许佳琼编, 邓石如研究资料,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 [33] 严迪昌. 清诗史[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 [34] 毕沅. 金阙攀松集序[C]// 严冬友诗集(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1450册).
- [35] 张埏. 题毕秋帆中丞高秋陟华卷子[C]// 竹叶庵文集(卷十三), 续修四库全书(第1449册).
- [36] 钱大昕.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C]//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37] 倪慧颖. 从《吴会英才集》的编选看乾隆中后期的诗史景观[J]. 苏州大学学报, 2009(4): 56-57.
- [38] 毕沅. 吴会英才集序[C]// 吴会英才集(卷首), 清嘉庆刻本.
-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40] 沈德潜. 说诗晬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41] 柳得恭. 溧阳录(卷二)[M]. 沈阳: 辽海书社, 1934.
- [42] 毕沅. 吴会英才集小序[C]// 两当轩集(附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Bi Yuan shogunate and the late Qianlong Parnassus

HOU 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i Yuan shogunate was one with the greatest medium-term impact in mid-Qin dynasty, where almost all important Qianlong poets and scholars were hosted or associated. Gathering the shogunate in its activities, Bi Yuan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circle with his identity as official guide. On the one hand, he strove to maintain Parnassus “Yazheng”; on the other, he built a strong emotional identity with the house guests. The fact that Bi Yuan shogunate communicated with both “courtly” and “wild” forces reflected that both styles of the late Qianlong Tang poetry and Song poetry were fused, and that the shogunate in the activity “as Dongpo life” promoted the re-understanding of Song poetry, which was complex literary ecological microcosm of late Qianlong poetry.

Key Words: Bi Yuan; Shogun literary salon; Literary ecology

[编辑: 胡兴华]